

WENHUAZHIXUELUN

文化哲学论

蒋荣昌



文化哲学论

蒋 荣 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文化哲学论

WENHUA ZHEXUE LEN

蒋 荣 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 峨眉)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6

字数: 121千字 印数: 1—13000 册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22—052—7/G 004

定价: 2.00 元

自序

这里没有大前提，因为它没有三段论。

一切都是新的——这就是作者的追求。他常常感到，真理是在高速运转的大脑里突然蹦出来的。那是生命在闪光，是憋闷了的灵魂苦痛的呻吟。爱真理是痛苦的，而正是为了这种痛苦的幸福，许多人把生命转换成为苦恋的激情。

这里是思想者的足迹。他希望真率地写，正象他希望真率地活。

作者于1988年1月13日

目 录

上篇 文化的前提

人的悖论——主体性的重新说明	1
历史从这里开始	11
生命的表达式	20
生活方式的抉择与文化走向	27
终极目的的“?”	36
幸福原理	45
牛顿的文化学原理	53
需要原型的文化指向	61
人就是人的生活	69
万花筒和气球提供给我们的	77
进化？还是互补？	86

下篇 文化动力的衍射

性文化——人的再生产和非生产性	
劳动	91
宗教文化	99
规范文化	108

群落建构文化	116
符号文化	124
“有限无边的世界”——价值	132
血缘纽结与亲族称谓	141
嵌合与碰撞	
——文化型、主体文化、亚文化	150
河床的黎明与山地的余晖	159

后 记

上篇 文化的前提

人的悖论——主体性的重新说明

“他躺卧在永恒的困扰中，永恒的困扰，人的终点……”（瓦雷里《蛇》）。与人类历史的永恒进程形影相随的，正是永恒的困扰。当人们试图到外部世界去寻找一个永恒依托，一个伊甸乐园，一个倾诉苦痛与召唤幸福的上帝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他自己。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的《创世纪》，但你找不到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对祖先的追忆。毫不夸张，人的问题，是人类思考得最久而又最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只有人类可以骄傲地说，“关于我们自己……”，大自然却只能悲哀地“通过人类反思自己”（恩格斯）。然而，“思考得最久而又最具有永恒意义”这种特出的魅力，拥有的却是一个并不那么愉快的前提——它最让人困惑。

狄德罗以人的中心地位来排比他的《百科全书》，试图从人的创造成果，人的生命能量的外在现实中发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也许他并没有成功，但他至少知道了人的创造物在指向世界的时候就只是在指向着人。然而，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理解人的外在现实，凭借什么？我们的唯一凭借依然是人、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体验，一句话，依然是人的生活。这是人类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悖论地

位。作为大自然的造物，他既是主观，也是客观，既是他自身，又是他自身的反映。即便是他那奇幻莫测、来去匆匆的心理体验，似乎是对外部世界的不经意的回应，也浸透了无可回避的人性必然。没有一个严肃的哲学家，甚至还可以更彻底些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自己的内心趋向，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的标本、一个活的尺度、一个活的生命的形式。也没有一段历史的轨迹不是由在那段历史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尸骨作枕木铺成。“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体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人类历史就是无数世代的人们用成功与失败，忧伤与欢乐编织而成，就是人类整体的生活追求汇归而成的大河在崎岖不平的地球上爬行和奔腾的沟痕。历史是由生活者们的脚步踏成，是妈妈温情的眼睛，婴儿粉嫩的稚手，老农铜色斑斓的风霜脸，军人直刺蓝天的大炮，读书人学究气十足的脑袋，村姑闪亮纤细的绣针……一句话，人的生命，和这种生命的延伸。人归根结底是在自然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发现了自己。历史必然律和自然必然律在这儿达到了真正的同一。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命的特有表达，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现实展开。这是一个永远向前不可逆转的过程。每一历史片断，每一文化群落，都是人性之流与世界堤岸碰撞激出的波澜。这种碰撞就象任何一次自然波澜的掀起，拥有不可重复的独特——卷走了的就被永远卷走。加尔文相信，上帝在最初就已经安排好世界的一切秩序和进程，而大自然正是这样的上帝。从大自然那里获取了“第一推动”并同时得到一个新的起点的人类，在双脚落地的同一瞬间，就被赋予了无数序列的文化“软件”。在这种最初的限定和以后的序列展

开之间，贯穿着一条人性必然的红线，“历史不外是自然史的现实的一部分”（恩格斯）。人性从来没有在事实上是某种块状的、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象洛克之类的近代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种形态，它的存在永远生生不息，指向未来，并且就在它的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显现里确定它自身的存在。一切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伦理规则、宗教形式、文学艺术、哲学创造，乃至民情风俗，一句话，每一种文化范型、生活方式，都是人性的某种特定的投射，人类群体生命存在的共同表达。文化作为人类的超生存特性，作为精神生活的符号系统，是人类自己的印记。与动物的一次性生命，与它们那种永远也超不出自己皮肤的生活截然不同，文化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对自我胚基的重塑。不可阻遏的创造冲动，如潮似浪的需要迁移，使得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忘却对自我的表现，不可能忘却对非我的自我化。而这一切，正是历史的进程。

在这支时而繁管疾弦，时而轻快纾缓的历史进行曲里，蕴含着一连串深刻的悖论。在这儿，客观规律，那些铁一般的不可移易的自然法则，再也不具有冷冰冰的超然物外的面孔。它们就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不起眼的平常人的喜、怒、哀、乐里，就在人们的每一次认知，每一次情绪体验中藏起自己并不高大的躯体。亚里士多德说，“思想可以成为思想的对象”。在人的世界里，人本身，人与人的关系也成了人的对象。历史规律并不外在于人类，人的主观追求也决没有跳出历史规律的界碑。主观追求，既是植根于人生最深处的人性必然，也在现实性上是这种必然在文化传统和外部世界中的成型和变形。思想本身作为思想的对象，和主观追

求作为思想的对象，物化了的思维——思想材料——作为思维的对象，揭示出主观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化。由此，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便只有在严格的认知活动中才具有实际的和绝对的意义。列宁早就写道：“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不仅如此，人们的思维形式、感觉形式、情感形式之类内心的建构，纯粹的主观，拥有着它们自己才有而不为其他任何生物所具有的形态，不可辩驳地得自大自然的原始惠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被先天地打上了客观的烙印。千百年来的人类在知识论上一直试图挣脱主观的藩篱，归向外在的永恒。一代接着一代的努力，从苏格拉底的辩论，到科学哲学的论争，从康德深刻的预告到夏皮尔们对康德的回归，人们终于开始更深地懂得，自己从来没有也永远没有可能甩掉自己。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思想思想，用自己的感觉感觉，用自己的内心建构去建构，用自己的判断去判断，用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主观追求去统率自己的实践体系，一句话，他只能用他自己作为万物的尺度。而这种主观，恰恰就是对主观的否定——大自然的烙印具有不可动摇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人是万物的尺度”，主观和客观的相互设定，决定了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对自我的肯定同时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对于理解人类、理解人类文化，需要首先理解的便是历史规律的悖论。英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威尔逊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是神，还是虫？”不管这个问题提得有多么古怪，也不管是否“社会太困难，难以理解”（美国小说家梅勒），

当代人的确面临着一连串共同的困惑：人们怎样确定自己的生活？人是高贵的自我主宰的生物，还是象浮萍一样任随风雨吹拂？社会是以每一个人为细胞的有机体，还是一股无视人的存在，只管滔天卷去的洪水？历史是什么？是循着钢铁轨道一往无前的火车，还是人类集体行军的行列？是人的躯体、人的苦痛、人的幸福砌成历史的金字塔，来为上帝贡献一份丰厚的祭礼，还是历史本身并不寻求什么外在目的而只是为了生活在它里面的人们的幸福？人能否在把自己对象化的同时，摆脱对象化的自我对自我的主宰……？人们常常在高喊，“历史车轮不可阻挡”，实际上，“不可阻挡”的正是人们自己的脚步。历史是一个有机生长的无尽历程，代代相承而又光景常新。特定时代的人们面临着的总是一些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将来的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些与他们独特的生活追求，生命流泻的独特方式相为表里的问题。超越过去，打破过去的大门大踏步走出来，是人的生命的创造本能。人的生活框架、生活理想、对自己的生命的规范、内心对未来的呼唤，变动不居，不主故常。个体的生命历史如此，整体的生命潮流又何尝不是如此！翻开中国的历史，一幅宗法社会的图画，笼罩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是与生俱来而又再也挣脱不掉的亲族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在各种各样的内外牵扯中，他得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就被固着在某一个纽结点上。个体的情感表达、生命流泻，便都在亲族网络里获得一个形式。与上下左右的关系和这种关系规定的特定交往模式，成为他的生命的特有表达。对应于他的“身份”的，合乎伦常的生活方式，铸就了他并且就是他。一个“严父”、一个“孝子”，一个具备刚性能够以刚治柔的丈夫，

一个顺从“父母官”，象忠于自己一样忠于君主的标准的臣民……这整个系列的平面，他的全部生活，终于构建成功一个立体的站立起来了的他。而这一切，也正是他的生命的全部表达。以宗法为经纬建筑起来的中国封社会的国家大厦，作为中国文化的习惯体制，是古代中国千千万万的人们生活追求相互拮抗，相互碰撞诞生出来的总体生活方式的硬壳。这种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地重新生长出来的硬壳，具备着将自己的全部细胞汇聚为一个生命整体的天然职能。生活方式世代传授的过程，也就是它不断嬗变，背叛祖先的过程。从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到理学以“天理”扼制“人欲”，便既是儒学向儒教转归，纲常伦理日益宗教化的历史，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宗教化和生命能量受到越来越深刻的内在抑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就是这个民族的集体生活感受累加和递变的历史。在这儿，历史规律不可能具有和自然律完全重合的形态，不可能具有固定的轨迹和单一的线索。正象个体的身体发育，发育成型的无限多样的随机可能，都是先定基因组合的不同程度的表现形态，历史的走向也是先代生命追求累加而成的当代人的各种生活追求，自我调控，自我融合，从而获得一个新的机体形式和生命之流的一个新的定格。历史规律是人们自我选择的随机律，铸模的复制永远没有立脚的场地。注定了的丰富多彩，注定了的不注定，使得人类的不同集团自然而然地使用着各不相同的一套笔墨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农业社会和由此而来的特别强固的亲族网络，捆绑住了最初的中国人，而这种最初的规范，成为方块字一样牢固的传统，让中国人几千年来习惯于同一种书写）。步伐决不相同，道路也根本不会一致，历

史轨迹天然地具有变化多端的形式。似乎人的身体里贮存着一整部基本语汇辞典，没有一个语句不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构件。人类文化的千姿百态、从繁富的文化背景中生长出来并且就构成文化本质的同样繁富的生活方式，也无一例外地是人类自身“文化符号系统”的组合成功的“语句”。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人性潜能的不同侧面的外现。正是这些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形态，揭示着人性自身深刻丰富的内蕴，揭示着人性越来越清晰但又永远不可能一览无余的完整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们就是人性形象的现实的部分。人类的主观追求，对未来的向往和对外部世界的索求，似乎是一堆盲目冲动的重迭，一团永远也理不清的杂乱思绪，一个随意约定的象棋规则，一句话，让人大惑不解，活蹦乱跳的什么东西。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某种外部的支撑；于是，历史规律作为这种支撑点便被看成和人类自身油水分离、毫不相干却又象地球一样吸附着人类、让人动弹不得的冷峻的最高法官；于是，自然界的规律和人类世界的规律便在这种让人心安理得，让人感觉到找到了某种坚强依靠的解释里，戴上了共同的面具；于是，马、恩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误解和最粗暴的剽窃，“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类自身创造自身的历史”、“历史不外是自然史的现实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将融合为一门科学——“人的科学”，这些辉煌的语句，成了一堆视而不见的幻影。象棋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规则呢？那只是因为，它需要规则，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个人们的娱乐所普遍需要的行之有味的规则。不言而喻，任何一个“约定”，任何一次貌似不经意的历史冲动，都是人性内部必然的真实投影，是

千百年来绵亘未绝的生活之流，自我开辟河道和遵循着自我开辟的河道向前推进的运动。正象河道既是河流的产物，又是河流的规范，历史规律也溶解在人的生命的血液之中，就在人的生活之流的自我创造之中，在人性必然所禀受的大自然的原初规定和永恒进展之中，确定自身的存在和得到自己的形式。大自然既在“通过人类反思自己”，也在通过人类选择自己的运动方向。

恩格斯说过，历史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孔子在谈到颜回箪食瓢饮，身处陋巷的生活时说：“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这个“乐”，正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和动物的纯粹肉体生活不同，人并不单单着眼于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换。生物性的同化和异化的过程，在人那里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在人的任何一种最具有本能和机体意义的活动中，都灌注着独特的精神追求。为人的独有生存方式，文化，所具有的人的活动体系的程式化，以及这种程式化活动体系的物化延伸，使得同一种生物本能的现实形式，呈现出无穷无尽的相关变化。抽象了的生物本能和生理过程，不可能成为人类生活的目标。作为一种生活理想，一种生命追求的对象化形式，生理的、物质的需要，从来都是过滤了的不再具有抽象形态并且在文化的系列活动体系中得到了“合法”地位的人格力量的外射。追求满足的过程和满足过程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合乎规范、作为理想的目标的肯定。文化目标是人类超生存生活本质的具体化，人的生命的升华形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人类生活的任何片断都是混整难分、血肉相连的同一境界。物质生活精神化和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

日益牢固和全面的操纵，填满了历史履历表的所有表格。对人类多元的精神需求和它的同义词“超生存生活”传达得越充分、越深刻、人类生活的幸福量度越大，生命能量的升华越彻底，社会的整体形态与单个人的个性发展、人格修养也越完满。“乐”，或者它的白话文“幸福”，是人类生命活动和历史进步的最终依据，是人类存在的第一本体。伴随着对它的不懈追求的是人格的全面完善和生命能量的完整迸发，是人类多元交错的精神需求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对精神追求的日益充分和深刻的传达。说得更坦白些，人类迈向幸福的顶峰境界的过程，正是物质生活在自身的高度发展中，不断抛弃自己，投向精神生活怀抱的过程。

让人遗憾的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常常应和着丧钟的轰鸣。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把自己的脚印镌刻到外部世界，把非我的世界变成人的世界，是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个同化外部世界的过程，常常也就是内部世界异化的过程，这个人类充实自己、发展自身的过程，常常成为人类挖空自己，使自己日益空虚、贫瘠和畸形的过程。人与外部世界“鱼水相忘于江湖”的粗朴和谐被打破了，并且被永远打破。卢梭的“自然状态”，为席勒理想化了的雅典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礼记》的“大同”社会，斐颠的“无君”时代……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历史告诉我们的，除了幸福进行曲，还有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索取和对人自己的毫无理智的戕害。而这一切，正是人类生存本性的悖论。人类生活的必然要到外部世界去寻找自己的天然倾向，实现自己、证实自己也就是同化自然，改造世界，和生活必定是在生活背景里的

生活……就是人的生活本质。这样，个体和集体、肉体和精神、生物肉体和社会肉体，同化自然和自我异化、生存与“超生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追求幸福和背离幸福，都在人类生存本性的悖论那里找到了共存共亡的基石。人，不可能彻底摆脱异化，而且只有离开自我才能达到对自我的真正回归。而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过程。人的悖论是人类生活的逻辑线索，在那里埋藏着理解人类的契机。正是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才有希望走进人类文化的底层。

历史从这里开始

似乎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弗洛伊德理论这样认为：文明的历史也就是受到压抑的爱欲升华和爱欲与外部规范、与超我斗争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精神分析祖师的这种理论里，文明并不是人类自然的追求，正好相反，它是人类自然追求的扭曲和这种扭曲的副产物，是人类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的事实。既然“压抑”和“升华”是弗洛伊德“文明”的标志，这样的“文明”就没有理由和摩尔根或者汤因比的“文明”站在一起。更确切些说，它的真实含义是“文化”，是人类已经知道的祖先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历史。让人吃惊的是，弗洛伊德忽略了“文明”的事实是一个全人类的普遍事实，一个地球上任何一隅的人类都没有能够“幸免”的事实。这样，一个奇妙的推论产生了：人类全体自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是被扭曲了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过正常状态，因为已经知道的一切状态都是畸形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分析鼻祖想要给我们分析出一种什么样的“正常状态”来呢？既然有史以来的人类生存方式是人的本性的扭曲和畸变，所有的人都要吃饭又是不是一种新发现的人类流行病呢？遗憾的是，可爱的弗洛伊德先生在患了口腔癌这种“日常病”之后，就丧失了答辩的唯一通道。

与这位先生的见解相反，事实这样对我们说：文化正是人类的生存本性，是人类之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或超越一般动